

南方的新社會： 南方社會學如何看待全球化與在地化

何明修 南華大學社會研究所副教授 |
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

王宏仁 中山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所長 |
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學院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社會學博士

一、前言

有個名叫「南方」的幽靈在台灣的社会／學界中徘徊。向來，社會科學的知識建構集中於大台北地區，只有零星的少數相關系所位於新竹、台中、嘉義、宜蘭等地。不平均的空間分佈導致了失衡的研究觀點，台北都會被當成台灣社會的縮影，彷彿台灣其他地區是不存在的。因此，台灣的消費主義被簡化成台北101的購物行，台北捷運是新浮現的都會經驗，台北同玩節等同於台灣的同志運動，兩岸三通只是台北與上海之間的家務事。更甚者，由上而下的官方觀點、主流媒體的看法往往造成了一種刻板印象，中南部是過年回娘家的地方，東部是渡假的後花園。如果說南部人只是純樸天真的、傳統落後的，那麼南方的太陽底下，的確是沒有新鮮的事發生，更沒有值得研究者關注的議題。換言之，其他的地方社會經驗常常是被忽略的。

南方社會，在台灣的社会科學地圖上，也一向被視為污染、骯髒、低文化水準、沒國際觀的城市，當在地的人民選出民進黨的市長，或者陳水扁總統時，一個典型台北文化人的反應就是嗤之以鼻，例如面對2004年在台北凱達格蘭上抗議總統選舉不公的群眾與訴求，出現許多以台北觀點看天下的論點，包括中國時報的楊渡說：「藍營的人多的是上班族、家庭主婦、都會中產階級……綠軍的支持者較多是中南部的農民、工人、都市遊民。它（國民黨領導的抗爭）的理性、秩序與堅定性如果可以堅持下來，很可能開創另一種中產階級的社会運動模式。」唐湘龍：「327藍軍色彩太濃，掩蓋了更多的意義。裡頭是不是包含著中產階級對社会標準扭曲的空前焦慮？擔心一個靠恃相對低學歷、高年齡、非都會的愚民政權決定了台灣公共事務的判斷標準。接下去怎麼辦？你又準備認命了嗎？」南方朔：「泛藍在台灣都市新興中產階級的支持下，已開始取得了新的『道德制高點』。」彭蕙仙：「更應該要注意的是，這個中產階級的馬拉松式街頭運動背後所蘊含的人民的力量。」這些經典名言，都在建構一個核心概念：「優等的我們 vs. 劣等的他們」，所以北部人民的選擇是理性的、具公共意義的、有秩序的社會，而南部社會是農民、工人、遊民、愚民。透過如此的差異論述，台灣社會被建構為一邊一國：中華台北的子民是上流社會，台灣高雄的群眾是下層社會。

台灣的內部殖民，從來就不是什麼新鮮事，對百年來的統治者而言。

（二 學舌的「四腳丫」

黑皮膚的法國人法農，曾經努力學習法國上流社會的行為禮儀，有一天，他悠閒浪漫像個法國上流人士在里昂街頭漫步，幻想自己也屬於法蘭西帝國的知識階層，突然從他身邊擦身而過的小女孩對他的媽媽說：「黑鬼」。

原來，你可以模仿得跟我一模一樣，甚至比法國人還要像法國人。但是，你還是黑鬼。

在南方的社會，我們當然也看到這樣的學舌四腳丫，文化上，要以中國正統文化、台北文化為標竿，捲舌講北京話，優雅討論兩岸關係、大三通對台灣的貢獻，小孩子未來目標是念哈佛博士，英文從小要溜，不能講粗俗的台語，穿著要高尚得宜，遠離檳榔菸酒，要多上文化藝術課程，常聽西方古典音樂，參觀西方印象派藝術畫作，培養高尚情操氣質。

於是社會的流行，就如齊末爾（G. Simmel）說的，是一個你丟我撿的模仿過程，被殖民者/中下階層者，花盡力氣要模仿上流統治者的一切，除了透過金錢競逐來擠身名流外，更希望透過模仿上流社會的一切生活風格，包括髮型、服飾、言談、舉止動作、飲食、娛樂等，來證明/幻想自己是上流社會的一員。這是自我殖民的心態，因為上層者也會試著跟下層者進行區隔，凡是下層社會可以模仿並且達成者，必定要再創造出新的生活形態與風格來，以便彰顯自己的優勢，這樣的優勢地位，不僅僅是金錢的獲取，還包含許多文化的意識型態。例如三十年前的台灣，稱呼肌肉滿身的工人或農夫為「頭腦簡單、四肢發達」，但是當台灣於1990年進入中產階級社會後，多數人成為辦公族，服務於第三級產業，每天過著無暝無日的加班生活，連照射到陽光的機會都很少，身材成為「中廣」「副總（腹腫）」，肥胖成了一種罪惡，連國民健康局都來標準化BMI指數，超過標準值24就是過胖，必須進行減肥。此時有錢有閒的階級可以輕鬆享受運動健身的身材，或者花錢美容瘦身手術，來跟一般中產階級的肥胖身軀進行區隔。但是當越來越多的健身中心在全國各地開設，不落人後的中產階級也開始走入健身房想要訓練出傲人的身材時，上流社會早已經在進行另一種休閒有錢有閒的活動了，例如擁有私人遊艇、參與需要花錢且技巧性高的運動如駕駛帆船、打高爾夫球、北極探險，這可以稱為「Doing Class」（搞階級區隔）。身處南方的我們，若是沒看清此過程，以為我們現今所追求的是一個跟北方/台北普同高品味的事物，那麼我們就永遠是一位被殖民者，永遠是有著南方黑皮膚但戴著北方白面具的次等人種。

（三 需要一場南方的革命

南方社會早就該發生一場革命。我們的目的不只是一要扭轉社會各界既有的重北輕南現象，更重要地，我們也要徹底質問現有的知識生產實踐，重新建構一套社會學知識與社會的關連。針對在南方的社會議題，我們認為南方的社會科學必須要有去內部殖民的

認知，並且立基南方，開創新視野。

我們必須立足於地理的南方。空間上的親近性容許在地的參與觀察，以便更精準地掌握南方社會的基層脈動，更有意義地呈現以往被忽略的地方社會經驗。過去台北知識界的研究，許多都是基於台北經驗出發，例如認為所有的都市捷運都應該如台北一樣，在高雄高鐵站就聽到一名台北女子一直抱怨高雄高鐵怎麼這麼落後，不是室內的，還跑去問站務人員「高捷在哪裡」，不知道他們在台北時，會不會問別人「北捷在哪裡」？高雄地區的人口與通勤人數本來就不及台北都會多，而且台北的捷運也是政府出資後無償移轉給北捷經營，自然會有盈餘。但是高捷卻是經營團隊必須出資且自負盈虧，依照北部且資本的邏輯，賠錢的捷運就該關門，那麼全世界多數的大眾運輸系統大概都要停擺關門了。換言之，以台北的捷運經驗來看高雄，不考慮捷運作為公共政策一環的交通政策，只是單一指標認定盈虧才是經營的使命，就完全是以台北觀點看天下。政府學術單位開研討會時，只有給論文評論人評論費，但卻完全無法編列交通費，這也完全以台北的立場思考，好像所有的參與人員都住台北，不需要高雄台北之間的交通費用。

南北部經驗的差異，在2008年11月發動的野草莓學生運動中也可以看出。台北的學生運動每天爭辯民主程序合法性，吊著書袋滿嘴後現代後殖民再現場域身體政治，在學生與群眾之間拉起一條糾察線，但在高雄的野草莓學生則是忙著進入校園動員學生，製作海報或節目，而且每天晚上與民眾一起聽一群野學者的演講，中間沒有任何界線存在。沒錯，相對於台北的學生運動，高雄的野草莓學運是青澀許多，但在地的社會條件創造了迥異於台北的學運，甚至當台北還在爭論不休是否繼續抗爭時，南方的學運早就準備轉進校園做組織紮根的工作了。

我們關切社會的南方，亦即是在階級、族群、性別等各種社會支配關係上處於弱勢的那一邊。社會科學重視這一群沒有聲音的群體之聲音，並不只是基於人道主義的關懷；更準確地說，我們認為支配即是意味著反抗，各種弱勢群體的集結與動員不外乎是下一波社會鉅變的預告。

社會的變遷，從來不會是來自於主流社會的自我反省或改變，而是來自邊緣聲音與反抗所進行的改革。主流社會總認為他們所掌握的就是真理，就是全部，也就如羅蘭巴特說的，要把一些人為的東西說成像是自然的事物，並且把少數人的利益宣稱為代表全體人們的利益。

以勞資關係來看，資本家總是宣稱只有企業先存活，才能夠照顧到勞工的利益，在2008年下半年，台灣遭逢近半世紀以來的金融海嘯衝擊，企業停工生產，許多勞工被迫「無薪休假」，從資本家的角度來看，這是最佳的策略，可以降低成本，也可以逼使勞工自動辭職。但這樣的制度，符合了誰的利益？為何不是勞工提出減工時但不裁員的政策？

又例如同志運動，具生殖性的異性戀霸權意識型態，仍然主宰著當前的法律規定與家庭體制，因此在修法給予同志家庭同等權利上，幾乎毫無進展。為何異性戀者可以組織家庭，兩位異性之間結婚後可以領養小孩，相互繼承財產，但是兩位同性之間的婚姻

與家庭組織，卻被拒絕有領養小孩的權利，並且無法登記為伴侶，互相繼承財產或者登記為保險受益人。這樣的規定，純粹只是因為同性之間無法生殖而強加於所有人民身上的意識型態，並且被引述為代表全部人民/華人家族利益的說法，但其實也是具優勢團體對於弱勢團體的殖民而已。

最後，我們需放眼全球的南方。要深入理解台灣地理的南方與社會的南方，就不得不從這個事實出發，台灣是全世界分工體系的南方，靠著勤奮工作的人民，不斷地力爭上游。從中華帝國的邊疆、日本帝國主義的南進前哨站、戰後的國際加工基地，以及更晚近的區域經濟整合，台灣社會的風貌持續地受到外來力量的形塑。因此，只有立基於這種脈絡性的體悟，我們才能更清楚地定位台灣經驗的意義。

高雄、南台灣地區，自從1980年代因為美日廣場協定後而開始出現的資本外移，工廠歇業，失業浪潮狂襲，使得位處全球資本主義南方的高雄，必須不斷找尋出路來應付全球化的衝擊。但是這樣的經驗，並非是台灣所獨有，日本的「產業空洞化」歷史，以及引入大量外籍工人的歷史，都跟台灣過去二十年的歷史類似，也就是都位處以美國為首的東亞資本主義圈內，當美國有任何景氣波動的時候，整個東亞的資本主義發展自然會受到深刻影響，我們都是在同一艘船上，也因此我們在地的經驗，可以是別人很好的借鏡，同樣的，別人的歷史發展也是我們重要的參考點。

以跨國勞動力流動為例，台灣在1991年正式引入藍領的外籍工人，並且模仿新加坡採用「客工計畫」(Guest-worker Scheme)，只准許外籍工人在台停留一定期限，不允許他們移民到台灣。在2001年之後，也採取新加坡政策，允許雇主從移工的工資中扣除食宿費用。台灣此政策採取後，韓國政府也派人來台灣學習，並且把學習日本「研習生」制度，轉換成台灣的客工計畫，也就是一樣只允許外國勞動者在韓國停留一定期限，但不允許移民。最近更準備採用更低的勞動標準，可以允許雇主從移工的薪水中扣除食宿費用。這樣一種「東亞移工體制」的聚合，顯示我們不僅只是關心南方的台灣，也需借鏡世界的南方經驗，來探討我們本身社會發展與經驗具有的歷史意義。

四 提出南方的社會研究取向

要面對地理、社會與世界的南方，身處高雄的我們，需要更進一步提出新的南方社會研究取向，以不同於北方觀點的取向。

(一) 連接在地的與全球的取向

在南台灣鄉下，到處可以看到越南裔女性移民所開的河粉店，很多柑仔店也轉型為專門販售東南亞生活用品的雜貨店，遠從泰國、菲律賓、印尼等地來的移工成為最重要的顧客。在三、四〇年前，有志力爭上游的年輕人紛紛離開家鄉，來到繁華的台北都會；在現在，為前途打拚的年輕人都去了西貢、檳城、東莞、蘇州等地，在陌生的異地當起台幹，或者到美國矽谷開創投資事業的夢想。無論我們的主觀態度是抗拒或接納，懷念或是哀嘆，遺世獨立而步調緩慢的鄉間社會已經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全方位與世界接軌的鄉村，毫不設防地承受國際力量的衝擊。

因此，南方的社會研究需要知道，台灣是亞洲的台灣，更是世界的台灣。全球化也許是個新穎而流行的詞彙，但是對於廣大的台灣人民而言，絕非嶄新的現象。菁英階級透過其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試圖在此時代變局中鞏固他們既有的權勢；但是一般人民並不是置身事外，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也需要不斷地與全球化趨勢週旋。無論是關於居住、工作、婚姻等決定，他們所做的每一項抉擇都構築出我們所身處的當代社會之圖像。儘管全球化往往被認為是侵蝕了區域的限界，消弭了地方特色，但是有意義的社會經驗仍是產生於具體的時空脈絡之下。因此，更深入地探討在地生活，並不意味著閉門造車，反而是一種開創性的途徑，試圖掌握這種在地的與全球之間必然的辯證。

以東南亞來的女性新移民為例，他們因為多種不同的理由來到台灣，身處在台灣的家庭結構中，他們被期待扮演好太太、好媽媽與好媳婦的角色，這是傳統台灣家庭的想像。但是他們有其自身的文化，因此其文化會帶來不同的家族觀念、飲食、信仰制度或養育小孩的方式。這些差異，都會對台灣的家庭與社會結構造成影響，雖然是無聲的，不知不覺的，但長期的影響卻是不容忽視的。在地台灣家庭結構的變化，是連結到全球人口流動的議題上，高雄南方的在地特色，為這樣的在地—全球連結做了最佳的註腳。

（二）批判的取向

從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到2005年的高捷外勞抗暴，活力旺盛的南台灣孕育出各式各樣的社會運動，引領著台灣社會改革的步伐。大高雄地區擁有規模龐大的工會組織，一向是台灣工運的骨幹部份子。由於水資源的議題，高高屏南等地環保團體相互聲援與串連，共同構築出所謂的南台灣綠色革命。在嘉義新港、高雄橋頭、屏東林邊等南部的小村落，社區運動的花朵處處綻放。南台灣並不因為遠離政經權力的核心而感到自卑。相反地，正是因為有距離，反思才成為可能的，批判也才釋放出巨大的能量。南方社會不忸怩地學習統治階級的姿態，也不期待由上而下的施捨，他們寧可相信自己的雙手，腳踏實地爭取應有的權利。

現實存在的並不一定是合理的，而合理的是有可能被實現的。南方社會科學應呼應南台灣的反叛精神，因此，第一步工作就是質疑既有的現狀。社會學家Peter Berger指出，社會學所帶來的第一項啟發，即是社會並不是原本看起來的那樣。南方社會學將進一步地主張，「社會原本看起來的那樣」往往掩飾了許多沒有查覺的壓迫。其次，南方社會科學也將探討那一種社會制度的安排更可欲的，以及達到那種願景的具體途徑。過往的軌跡解釋了眼前的現狀，而當下種種的力量之抗衡將決定了未來的藍圖，南方社會科學應該致力使自身成為一股現實的力量，積極參與接下來的發展。

目前南台灣已經開始走出台北的幽靈，而對於不合理事物進行批判反省。但是還有許多不合理存在的事務，讓我們身處高雄南方的學界，更必須清楚知道我們的長短處何在。我們遠離台北政治金融中心，使得我們的聲音常常被忽略，但也因為如此，我們才可以秘密地、無聲無息地進行革命戰鬥，而當事情發生後，北方才會驚覺事情不是其想像的，這就如過去幾次年的高雄市長選舉結果一樣，跌破北方專家學者的眼鏡，但就如

高醫成令方教授所說，「對於（台北）媒體評論員，我要請他們走出錄影室與冷氣房，到高雄來好好做研究與調查，提出一些新的分析觀點，請不要再用陳腐過時的說法，來侮辱我們選民，綁架我們理性選擇的成果。」

（三）培養知識研究技藝的取向

就如同其他知識生產領域一樣，當前台灣社會科學也面臨了績效管理主義的強大壓力。隨著各種系所評鑑、研究計劃申請、升等審查等規則日益制度化，研究人員感到更大的壓力，被迫要順從體制內的遊戲規則。從一方面來看，對於研究人員的要求是有其合理性，因為這樣才可以促成更多以及更精緻的知識生產，無論是針對專業學群，亦或是社會公眾。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績效至上的評判標準也壓縮知識探索的自由空間。為了符合既有的評分項目，許多學界同仁被迫只研究可以在塞在期刊論文篇幅之內的議題，越來越多的作品是「輕薄短小」，可以被切割、分批販售於不同的刊物。

而更嚴重的問題，乃在於知識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產生斷裂，學界生產出一批毫無社會價值的論文，把自己封鎖在象牙塔，毫不關心實際社會的發展情形。以2008年馬英九上台後，法務部特偵組調查前總統陳水扁貪污洗錢案，在此過程中產生許多爭議的問題，例如「押人取供」「法官自由心證」「未判刑前手銬人身自由」「羈押的必要性」等，卻完全沒有任何一位法律學者出來公開討論這些與法學教育息息相關的問題，似乎法律學界是超乎社會之上的神聖殿堂。但是假如上課或者研究跟社會脫節，那麼這樣的知識技藝為我們人類有何貢獻？

因此，南方的社會科學應該反對知識朝向大量生產的發展趨勢，而且主張採取研究技藝的古典模式。知識技藝的大量生產導致了C. Wright Mills所批評的「方法論崇拜」之現象，彷彿要學會了某一種分析資料的方法，任何社會學問題都可以獲得解答。相對於此，南方社會科學主張重點於培養知識技藝，而不只是訓練運用研究方法的能力。只有學會了全神貫注地處理某個研究對象，並且知道如何與既有的知識系統進行對話，從而提出有意義的見解，知識技藝才能徹底完備。

（四）跨入鄰近亞洲社會研究的取向

在這幾年來，社會科學本土化研究的議題已經比較少討論了。原因並不是在於這項主張已經喪失了吸引力，相反地，在於大部分從業人員都將本土化視為理所當然的共識了。當初本土化訴求主要反對兩種現象，首先，由於西方學者無法進入未改革開放前的中國，於是只好將台灣視為華人／中國社會研究的替代品；其次，西方的理論概念被硬生生地套用在台灣現象，使得在地社會的差異性無法被呈現。隨著台灣主體性意識的提升，本土化運動所要對抗的「替代品觀」已經消失。晚近以來，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將東南亞、中國等區域納入研究領域，這是反應了學術社群的自信與進取，如果我們有能力處理台灣社會，那麼我們當然可以跨出去研究其他社會。

然而，為了導正西方理論無法妥善處理台灣社會的缺失，本土化的訴求反而帶了一種非意圖的後果：若干在地的現象被視為具有獨特性的，無法由外來的概念來解釋，因此只能本土經驗出發，由下而上地建構出一套特有的理論架構。這種獨特性的假定是矯

枉過正的結果，也斷送了跨國比較的可能性。事實上，很多被認為是正港台灣的產物也是存在於其他地區，例如中小企業、地方派系、關係主義等。更甚者，也由於台灣國內嚴苛的論文審查程序驅使研究者需要花更多的心神與既有的文獻以及國內審查者對話，如此一來，也更難跳脫出小規模學術社群的幽室恐懼症。

雖然我們是立足於南台灣高雄，但是我們卻應該積極走入亞洲社會，因為我們的生命跟亞洲發展是糾結一起的。1960年代的楠梓加工出口區把南台灣與世界資本主義連結在一起；1960-1975年的越戰，讓台灣的成衣紡織食品業大量輸出到越南跟美國，也讓台灣進口更多日本的機器與產品；經歷1960年代景氣繁榮的日本，在1970年代大量到台灣與東南亞買春，許多台灣女子也在此時外嫁到日本，成為日本的「外籍新娘」。1980年代的台幣升值，股市狂飆，土地價格高漲，使得南台灣地區的工廠紛紛移轉到東南亞與中國，連帶結構性失業問題也越來越嚴重。1990年代大量的台灣、中國、東南亞人民通婚，帶來了新一波的移民潮，高雄與南台灣成了多元種族文化的縮影社會。

這些歷史過程都彰顯著我們無法把台灣的研究抽離亞洲社會的脈絡來分析。因此，南方社會科學主張，我們應該積極跨入國際社會場域，與鄰近亞洲國家學術交流，將本土社會的研究成果與更廣大的學術社群分享。唯有如此，我們才能更周延地來審視台灣社會的各種現象，避免了普遍性／差異性的兩難抉擇。

（五 南方社會的呼喚

做為台灣社會第二大城市，以及對照於「中華台北」的「台灣高雄」，高雄應該勇敢的承擔為北方的他者，反射出台灣社會的不同面貌，也唯有如此，高雄才能走出內部殖民的陰影，建立自己的主體性，成為台灣的符碼，正港的「台灣高雄」，而不是像台北一般，永遠只是在中國陰影下的「中華台北」。

馬克思·恩格斯說：「哲學家只詮釋了這個世界，可是重點在於改變它。」

就走我們自己的路吧，不管他人怎麼說！

參考文獻

- Corrigan, P. 1997. *The Sociology of Consumption, An Introduc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Damm, Jens. 2009. "Multiculturalism in Taiwan" *Tongzhi in contemporary Taiwan: successful only on the surface? From a promising start to the abuse of a multiculturalist polic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Kaohsiung: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Sociology,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 Fanon, Frantz 著，陳瑞樺譯（2005），《黑皮膚，白面具》，台北：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Mills, C. W. 著，張君政、劉黔佑譯（2006），《社會學的理想》，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 中國時報（2008），〈短評高捷黑窟窿〉，中國時報。
- 成令方（2006），〈別再用過時觀點看高雄〉，中國時報。
- 張婷婷、張翰璧（2008），〈東南亞女性婚姻移民與客家文化傳承：越南與印尼籍女性的飲食烹調策略〉，《台灣東南亞學刊》，第五卷，第一期，頁93-146。
- 曾熾芬（2004），〈引進外籍勞工的國族政治〉，《台灣社會學刊》，第32期，頁1-58。